

新加坡公益组织在网络素养教育中的作用

王国珍

(湛江师范学院 媒体素养教育研究所, 广东 湛江 524048)

【摘要】“网络素养教育”，是指提升网络使用者“网络素养”的教育。“网络素养”则是指对网络信息的辨识能力、避免网络沉迷的自我控制能力，以及防范网络有害信息的自我保护能力等。新加坡公益组织在网络素养教育中起到独特的作用，体现在如下三大方面：首先，公益组织扮演了网络素养教育先行者的角色；其次，公益组织是新加坡政府大力推进网络素养教育的重要合作伙伴；再次，新加坡公益组织还承担起网络素养教育领域“无冕导师”的职责，培训了大批从事网络素养教育的师资和相关人员。

【关键词】网络素养教育；公益组织；新加坡

【中图分类号】G211 **【文献标识码】**A

公益组织是一种非政府(Non-government)、非营利(Non-profit)、非党派(Non-partisan)的民间志愿性组织，如慈善机构、志愿者团体、社会救济组织、人道救援组织及某些环保组织等。公益组织特别关注社会公共利益问题，尤其重视服务于社会弱势群体。^[1]

在西方发达国家，民间公益组织已经成为社会公共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在公共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填补政府管理的的空缺或失灵。^[2]

本文拟在探讨网络素养教育含义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公益组织在新加坡网络素养教育中的作用。分析新加坡网络素养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公益组织起到了如下三方面独特的作用：

首先，新加坡公益组织是网络素养教育的先行者，推动了网络素养教育在新加坡的兴起和发展；其次，公益组织是新加坡网络素养教育中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要合作伙伴，是新加坡网络素养教育运行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再次，公益组织是新加坡网络素养教育领域的“无冕导师”，培训了大批在教育界或商界从事网络素养教育的师资和工作人员。

“网络素养教育”的含义

“网络素养教育”，是指提升网络使用者“网络素养”的教育。“网络素养”则是指对网络信息的辨识能力、避免网络沉迷的自我控制能力，以及防范网络有害信息的自我保护能力等。

“网络素养”概念源自“媒体素养”(Media literacy)。“媒体素养”，又称“媒介素养”，主要指对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内容的分辨、质疑和批评能力，以及对媒体内容进行合理使用和理性消费的能力。“媒体素养教育”顾名思义则指旨在提升媒体素养的教育。

[作者简介] 王国珍，博士，副教授，湛江师范学院媒体素养教育研究所所长

需要注意的是，“媒体素养教育”和“网络素养教育”作为新兴的学术用词和专业术语，既不能将之与传统新闻教育层面上的采写编评相混淆，也不应将之与计算机技术教育层面上的软件使用技能、编程等相混淆。

在新加坡，对“媒体素养”概念有个正式的官方定义。例如，作为新加坡政府职能部门的媒体发展管理局(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在其官方网站上对“媒体素养”作出如下解释：“媒体素养”是指批评性地分析各类媒体上日常信息的能力；当一个人具备了媒体素养，他就有能力阅读、分析和评估各种信息，不管他是想通过媒体获取信息，还是出于娱乐或者教育的目的。^[3]换个角度说，如果一个人不具备网络素养，他就无法分辨网络信息的真假或好坏，就有可能成为网络虚假信息和网络欺诈等的受害者。或者，如果没有足够的网络素养，网络使用者就容易沉迷于网络游戏或网络色情等而不能自拔，使工作、学习、健康和 life 受到不良影响。

随着因特网的日益普及，新加坡各界对“媒体素养”的关注逐渐集中到“网络素养教育”这一领域。“网络素养”对应的英文有“Cyber literacy”、“Internet literacy”、“Network literacy”等。在新加坡，网络素养教育领域较为普遍的关注议题是“网络健康”(Cyber wellness)和“网络安全”(Cyber safety)等，即强调网络使用中的健康和安全问题。

其中，“网络健康”(Cyber wellness)是新加坡使用频率高并得到普遍认可的一个网络素养教育用词。例如，新加坡通讯及艺术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he Arts)组建了一个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 on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on Society)，专门研究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在2008年该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正式报告中，特别对“Cyber wellness”作了如下定义：新加坡创造性地使用了“Cyber wellness”一词，意指能对网络使用者带来正面效果的健康的网络文化氛围；它涵盖了对网络有害行为的辨别能力、免受网络危害的自我保护和保护他人的警觉性，以及对网络如何影响个人和大众的基本认知能力。^[4]这里，“Cyber wellness”一词，超越“网络健康”的释义范围，被解释为涵盖了网络安全和网络健康两大方面的内容。

也就是说，在新加坡，“Cyber wellness”成为网络素养教育中的一个专业术语，被赋予了健康和 safe 地使用网络的含义。另一例子是，新加坡网络素养教育的先行者“触爱社区服务社”(TOUCH Community Services)，是新加坡一家知名公益组织；其精通中英双语的一位华裔项目经理，将“Cyber wellness”翻译成“网络健全”，以试图包含网络健康和网络安全两大内容。^[5]

公益组织：新加坡网络素养教育的先行者

在新加坡网络素养教育史上，公益组织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起到了推动网络素养教育兴起和发展的开拓性作用。新加坡公益组织的这种先行开拓性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最早在新加坡发起网络素养教育的是一家公益组织；其次，新加坡其他公益组织积极跟进，互相合作，联手推进网络素养教育的发展；再次，新加坡公益组织与国际知名网络素养教育机构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在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也向国际社会输出自己独特的网络素养教育理念和实践。

(一) 公益组织“父母网络顾问组”(Parents Advisory Group for the Internet)，最早在新加坡推出网络素养教育项目和活动，成为新加坡网络素养教育的拓荒者。

新加坡网络素养教育的起源，大约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1999年，一家名为“父母网络顾问组”(Parents Advisory Group for the Internet)在新加坡正式成立，旨在教育公众和父母如何安全使用网络，使网络发挥积极和正面的作用。该组织是一家非营利性公益组织(Non-profit organisation)，各项教育活动主要由志愿者或合作机构开展和承办。短短几年时间，“父母网络顾问组”就吸引了数百名志愿服务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包括教育工作者、商界人士、退休人员 and 家庭全职主妇等。志愿者们自愿奉献，以引导孩子恰当和理性地使用网络

为自己的使命，致力于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网络使用环境。^[6]

作为新加坡网络素养教育的先行者，新加坡“父母网络顾问组”开展了一系列提升公众和父母网络素养的对外拓展性项目（Outreach programmes）：1999年，创建了PAGi网站，用作志愿者与父母交流思想和发现问题的平台；2000年，在编写关于安全上网教程的基础上，面向父母开办了名为“安全网络之旅”（Making the Internet Journey Safe）的讲习班；同年还面向学校、业界和社区举行了安全上网主题的巡展（Roadshows）。^[7]

（二）新加坡其他公益组织积极跟进，密切配合，使得萌芽状态中的网络素养教育很快在新加坡遍地开花。

除了独力进行一些拓展性的网络素养教育项目和活动之外，新加坡“父母网络顾问组”还与其他组织、机构和团体合作，举办网络安全培训班，以期让更多的不同族群和语言背景的公众受益。据悉，“父母网络顾问组”的合作伙伴分别有：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下属教育培训公司“the ONE Learning Place”、印度裔新加坡人的自助性团体“the Singapore India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马来裔新加坡人自助团体“MENDAKI”、新加坡草根组织“the People’s Association”、新加坡社区公益团体“TOUCH Youth Services”，等等。^[8]

新加坡“父母网络顾问组”与其他公益组织和团体的联手合作，使得健康上网和安全上网的理念，为更多族群的父母和孩子所认知和践行。

（三）新加坡公益组织还与欧美国家的网络素养教育机构合作，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做法，将之灵活地运用到新加坡网络素养教育的实践之中。

应该说，新加坡公益组织早期的网络素养教育，是在国际相关组织的帮助下，通过互相合作的方式，才得以有效地展开的。例如，在美国网络素养教育相关组织“网络天使”（CyberAngels）的帮助下，新加坡“父母网络顾问组”组建了一个名为“网络妈妈和爸爸”（Cyber Mums & Dads）的团队，创建了一个网站，专门教育孩子如何安全上网。再如，美国的“在线因特网研究会”（The Online Internet Institute），前来新加坡面向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开设了关于网络安全的讲座。

另外，新加坡“父母网络顾问组”还加入了国际性组织“互联网内容评估协会”（the Internet Content Rating Association），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向国际相关机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2001年，“父母网络顾问组”还与新加坡“国家因特网咨询委员会”（The National Internet Advisory Committee）携手，举办了新加坡首个以网络安全为主题的国际性会议；该会议名为“安全冲浪2011”（Safe Surfing 2001），来自世界各国的与会者代表达400多名。^[9]

“安全冲浪2011”这一国际性会议的召开，加深了新加坡政府对网络素养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使得新加坡网络素养教育从“民间呼吁和先行”的萌芽阶段，很快进入到“政府回应并积极介入”的发展阶段。与之相应地，新加坡民间公益组织，由此也完成了网络素养教育拓荒者的任务，开始肩负起网络素养教育政府合作伙伴的新使命。

公益组织：新加坡政府推进网络素养教育的合作伙伴

梳理新加坡网络素养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史，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特点：公益组织是新加坡政府推进网络素养教育的重要合作伙伴；两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使网络素养教育呈现出良性发展态势。

公益组织与新加坡政府的密切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公益组织所开展的网络素养教育项目和活动，往往能得到新加坡政府职能部门的资助和支持。换句话说，以廉洁高效著称的新加坡政府，对公益组织推广网络素养教育的诉求，回应非常迅速，并注重发挥公益组织的特长和积极性。

新加坡知名公益组织“触爱社区服务社”(TOUCH Community Services), 堪称新加坡网络素养教育领域的翘楚; 其与新加坡政府的一系列互动和合作项目, 可以说是公益组织作为新加坡政府职能部门合作伙伴的典型例子。

“触爱社区服务社”成立于1992年, 所提供的公益性服务范围非常广, 服务对象包括儿童、青少年、老人、低收入家庭、病残者等。1998年, “触爱”创办人Lawrence Khong 荣获新加坡总统授予“公共服务奖章”的最高勋衔。2001年“触爱”在其所设的“青年服务队”(Youth Services Group)之下, 新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网络素养教育的服务中心, 名为“触爱网络健全”(Touch Cyber Wellness, 以下简称“触爱”), 向在校学生和社会青少年提供网络健康使用培训和网瘾咨询等服务, 成为新加坡媒体素养教育先行者之一。

自成立至今, “触爱”已为新加坡超过280所的学校提供了网络健全教育课程, 所服务的青年、父母、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士更超过80余万人数。“触爱”之所以能将其网络素养教育推广得如此成功, 是与新加坡政府的支持和资助分不开的。也就是说, “触爱”的许多网络健全教育项目和活动, 是在与新加坡政府职能部门的合作中顺利展开的。根据“触爱”网站资料, 其与新加坡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有过不少合作项目, 其中主要有:

2001年, “触爱”开发了一个名为“CRUSH”的项目, 旨在帮助在校学生安全地浏览网页和使用网络; 这一项目得到了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的资助。

2004年, “触爱”与媒体发展管理局再次合作, 编写了网络健全教育大纲, 以帮助其他教育机构和公益组织更好地传播健康上网的理念。

2005年, “触爱”受媒体发展管理局委托, 为其他政府授权的教育培训中心进行师资培训。

2006年, “触爱”与新加坡国家青年理事会(National Youth Council)合作, 专门为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编写了一本《网络时代的离线指导》(*The Offline Guide for the Online Generation*)手册。

2008年, “触爱”在新加坡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Ministry of Community, Youth & Sports)的支持下, 出版了《父母网络健全手册》(*Cyber Wellness Handbook for Parents*)一书, 该书同时被新加坡教育部发送到政府学校小学三年级至中学3年级的父母手中。

2011年, 新加坡媒体发展局发起了“网络健全运动”(Cyber Wellness Campaign), “触爱”成为该活动的独家讲授者和论坛主持人。^[10]

由于其出色的社会服务和公益活动, “触爱”荣获“2011年新加坡青年奖”(The Singapore Youth Award 2011), 该奖项是新加坡社会服务中社区和青年类的最高荣誉。

“触爱”之外, 新加坡其他公益组织也得到了新加坡政府职能部门或多或少的资助和支持(这里不再一一例举)。作为新加坡政府的重要合作伙伴, 公益组织借力于政府, 将网络素养教育推上了良好的发展轨道。

公益组织：新加坡网络素养教育的“无冕导师”

本着利他利民利国的精神, 新加坡公益组织还承担起网络素养教育领域的“无冕导师”职责, 促进了网络素养教育的健康发展。

新加坡公益组织的“无冕导师”作用, 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一方面是“师资培训”, 即为学校教师、私营教育机构讲员以及社会工作者, 提供网络素养教育课程培训; 另一方面是“教材编写”, 即开发网络素养教育课程或项目, 编写教材或指导手册, 并将相关资料在网上公开, 为有意进入网络素养教育领域的人士免费提供宝贵的学习资源。

新加坡公益组织承担了大量的网络素养教育师资培训任务。例如, 知名公益组织“触爱”, 于2003年至2005年期间, 在新加坡国家教育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培训了约2000名教育工作者, 教导学员们从青少年的视角看待网络使用问题, 了解网络沉迷的原因

等。2005年,受新加坡政府职能部门媒体发展管理局委托,“触爱”培训了5家商业性的教育训练中心,以帮助他们能独立地为青少年提供关于健康安全上网的教育项目和咨询。2006年上半年,“触爱”培训了200名社会工作人员,使他们成为训练有素的从事网络素养教育人士。^[11]另外,“触爱”还大量培训青年志愿者,从2001年到2005年期间,“触爱”共训练了600多名青年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是从上过网络健全项目的学生中挑选出来的,“触爱”称之为“网络健全大师”或“青年同领导师”(peer mentors),负责指导学弟学妹们如何健康地上网,养成良好和理性的网络使用习惯。^[12]

培训师资之外,公益组织还承担了网络素养教育的课程设计、教材编写、活动策划等工作。例如,“触爱”专门开发了一个网络素养教育的网站(<http://www.planetcrush.org/>),进入该网站,上面关于网络素养教育的网络教学资源十分丰富,包括:(1)教学参考书,如《父母网络健全手册》(*Cyber Wellness Handbook for Parents*)、《新加坡流行电子游戏父母指导手册》(*Parents' Guide to Popular Games in Singapore*)、《网络时代的离线指导》(*The Offline Guide for the Online Generation*)等;(2)教育项目,如学校教育项目(Educate School Programme)、青年体验项目(Experience Youth Programme)、装备成人项目(Empower Adults Programme),列出了详细的教学和活动大纲;(3)还有一些详细的活动方案,可供观摩和借鉴。^[13]这些网络素养教育相关的书籍、参考资料和手册,有的还被新加坡教育部下发到各中小学校的学生及其父母手中。

由此可见,新加坡公益组织堪称网络素养教育的“无冕导师”:虽然没有正规学校的名分,却承担比公立学校更多的师资培训任务;虽然不是公立教育体制内的教师编制,却承担了比公立编制教师更多的教学工作和教材编写任务。

结 语

公益组织是新加坡网络素养教育中的中坚力量:不仅是网络素养教育这块处女地的拓荒者,还与新加坡政府职能部门密切合作,开发课程和教材,策划项目和活动,培训师资和志愿者,使网络素养教育在新加坡迅速得到推广,并步入了良性的可持续性的发展态势。新加坡公益组织的这种独特的作用,对我国网络素养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在政策支持层面上,我国网络素养教育应充分发挥公益组织的作用,调动公益组织的积极性,并从法制层面给公益组织更多的合法的活动空间和政策支持。例如,在公益组织成立的审批上,应该简化程序,避免审批官员人为因素的夸大和干扰;在公益组织的管理上,应该确立一套尽量与国际接轨的合理透明的管理机制;同时,也应给公益组织更多的资助和优惠等。

在2010年两会上,15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个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的提案,呼吁把网络素养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瘾、网络欺诈等危害,提高其对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该提案背后,涉及到许多的实际问题:我国到底是否该将网络素养教育课程纳入中小学课程呢?所需的师资、教材、教育经费等问题如何解决呢?另外,有没有其它可行的办法或有效的途径来提升我国民众的网络素养呢?

新加坡公益组织在网络素养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无疑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参照方法。例如,网络素养教育所需的师资和经费问题,如果全部由政府教育部门或学校承担,势必是一必新的庞大的教育财政开支;但若能借用公益组织的力量和付出,师资和教材问题就多了一条切实可行和有效解决的途径。

另外,在政府管理层面上,我国政府职能部门应积极推动网络素养教育的发展,但切忌不要成为网络素养教育的包办者,而应该将政府所拥有的权利资源更多地分配给公益组织,两者携手,共同推进网络素养教育的发展。

如同存在市场失灵一样,也存在政府失灵。如果政府垄断过多的资源,权力过于集中,难免

滋生腐败，使得大量政府财政款项落入官员腰包；加上政府可能出现决策失误或规则执行不当，使得效率低下，服务水准低劣。所以，政府应该从“全能型”向“有限型”转换，将政府职能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而将对社会公共事务领域的管理职能和资源，更多转交给各类社会组织。^[14]

具体到网络素养教育这一领域，我国政府应该积极介入，承担起相应的政府职能。这种职能的承担并不是指非要由政府职能部门（如教育部等）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如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中小学必修课程，在各公立学校增设新的网络素养教育的师资岗位，有教育部或公立学校编写教材，等等。政府应承担的职能应该是，建立畅通的社会诉求回应机制和问题解决机制，集纳社会各方的力量，尤其要重视公益组织的作用，将权力资源和财政款项，更多地合理分配给各类从事网络素养教育的组织和人员，并建构起一套完善的运行机制，将网络素养教育推上良性的发展轨道。

注释：

- [1] 张尚仁. “社会组织”的含义、功能与类型[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3月(第21卷第2期)。
- [2] 唐娟. 西方国家的民间公益组织: 特质及经验分析[J], 《新视野》, 2003年第3期。
- [3] “What is Media Literacy”, www.mda.gov.sg/PUBLIC/.../Pages/MediaLiteracy.aspx, 2011-12-21
- [4] *A report by The Advisory Council on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on Society* (2008). Engaging New Media—Challenging Old Assumptions. <http://newarrivals.nlb.gov.sg/itemdetail.aspx?bid=13165641>, 2011-12-21.
- [5] 傅仰承.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干预[C], 《青少年网络成瘾及其干预——2005年沪港新专家圆桌会议论文集》,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年11月。
- [6] Frank Voon & Nicole Ong, *Making the Internet a Safe Place for our Children to Surf*, www.netsafe.org.nz/Doc.../netsafepapers_voonong_children.pdf, 2011-12-21.
- [7] 同上。
- [8] 同上。
- [9] 同上。
- [10] TOUCH Cyber Wellness, <http://www.planetcrush.org/whoweare/milestones.htm>, 2011-12-22.
- [11] 傅仰承.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评估和预防[C], 《青少年网络成瘾及其干预——2005年沪港新专家圆桌会议论文集》,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年11月。
- [12] 傅仰承.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干预[C], 《青少年网络成瘾及其干预——2005年沪港新专家圆桌会议论文集》,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年11月。
- [13] TOUCH Cyber Wellness, <http://www.planetcrush.org/>, 2011-12-23.
- [14] 张尚仁. “社会组织”的含义、功能与类型[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3月(第21卷第2期)。